

# 城镇化可梯度推进不可全面开花

陶克强 媒体人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其们进行座谈。当朱高峰院士提出要处理好城镇化和产业、就业的关系时,李克强接过头头说,兴城首先要兴业,有产业支撑才能有就业,特别是要发挥好服务业这一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9月8日新京报)

城镇化是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有研究认为,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按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增加 24.5 元,按 2010 年价格是 670 元;在我国近 10 年年均 10% 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 3 个百分点。专家坦言,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0.7 个百分点时,消费率、投资率基本稳定在 64% 和 35% 左右。

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与投资

需求,激发和调动了全国各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安徽提出到 2015 年城镇化率超过 50%,而 2011 年年底的城镇化率为 44.8%;广西提出到 2015 年城镇化率力争达到 50%,而 2010 年的城镇化率为 40.6%;贵州提出到 2020 年城镇化率达到 50%,而目前的城镇化率为 35%;云南到 2015 年城镇化率达到 45%,而目前的城镇化率仅有 36.8%。

借力城镇化提速,加快发展当地经济,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得不提醒的是,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因为,没有产业支撑,财政收入无法保障,公共支出无钱开支,基础设施难以改善,农民就业更是难以吸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梯度推进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间存在着产业梯度和经济梯度,存在梯度地区技术经济势差,就存在着技术经济推移的动力,就会形成生产力的空

间推移。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再向落后地区推进。在笔者看来,这一梯度推进理论对推进城镇化建设不无启迪。引申开来讲,推进城镇化建设要因地制宜,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就不能上,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切忌一哄而上,违背客观条件的拔苗助长,必然是“好心办坏事”。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是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化正在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实上,要让农民进城生活,前提是解决农民在城镇就业创业,而就业创业离不开产业发展。由是而言,唯有建立“产业发展—增加收入—拉动消费”这一良性循环,就能够真正地吸引农民主动留在城镇、融入城镇。

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没有“一刀切”,而是通过先试点、再推广的办法量力而行。2010 年 12

月,浙江在经济实力较强的 27 个镇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加快实现其由特大镇向小城市转型发展。试点两年,27 个试点镇共新吸引 48.3 万人落户,城镇化率提高了 5.8 个百分点;镇里供职于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达 88.9%,高出全省 5 个百分点;试点镇每万人新增个体工商户 95 户,是全省的 2.5 倍。

仅今年上半年,这些试点镇就实现了 GDP1091 亿元,其中 7 个镇超 50 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 159 亿元,其中 5 个镇超 10 亿元。更为可喜的是,这些试点镇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试点镇的农村居民现金人均收入为 11782 元,同比增长 19.4%,比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快 8.6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缩小到 1.72 倍。更可喜的是,这些试点镇的发展势头赢得了社会资本青睐,目前已有绿城、万达、银泰等 10 多家上市公司抢滩试点镇,

参与试点镇小城市建设的劲头十足。

这得益于一批改革新政在试点镇里推出:县里支持试点镇用地,安排一定数量的用地计划指标,单独切块,直接下达到试点镇;建立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城镇综合性管理;在核定的编制内,试点镇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内设机构;试点镇的行政级别不提高,但其部分镇的党政一把手升级,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等。

显而易见,让一批经济实力较强的镇先试先行,利用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优势和发展成果,带动农业现代化,推动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显而易见,这种因地制宜、尊重规律的推进路径才是政府期待、百姓满意的新型城镇化,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 多管齐下或可解资源城市转型难题

蒋廷军 资深管理顾问

我国神木、鄂尔多斯等诸多资源城市正面临“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其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家日报》9月9日“专题报道”))

尽管资源城市转型为世界性难题,但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可借鉴。较典型的资源城市成功转型案例有:日本九州由采煤重镇转为高新科技产业区;美国休斯敦由石油城转为以石油为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区;德国鲁尔区由煤区转为制造产业区;法国洛林由铁矿煤矿基地转为法国吸纳外资企业的窗口。等等。

观之资源城市转型成功的诸多案例,虽其思路与方法百花齐放,但仍可提炼出共同点来借鉴:

一、政府主导,强化统筹。要么地方政

府部门亲自主抓,要么成立专门的转型委员会负责到底。鉴于国情,在我国要特别强调:地方主政者当有“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的胸襟,因为资源城市转型多需打持久战,而我国的地方主政者调动较为频繁;

二、居安思危,转型趁早。高处黄金时期,就要开始考虑转型,因为转型是需要大量资金的,黄金时期有较好的收入。一旦资源枯竭收入差时,即便神仙来助都恐怕会无力回天;

三、政府大力给予财政补贴,用于设备设施的改造、新产品的研究、美化环境等;

四、尽量采用继承式而非割断式。对资源枯竭矿山或企业,不宜动辄“一关了之”,而是尽量深化其利用价值。譬如德国弗尔克林根钢铁厂停产,当地将其策划

予以升华后,竟获“世界文化遗产”殊荣,于是华丽转身为工业旅游亮点。这一点,尤其是我国大庆不妨好好参考一番;

五、同时导入新产业,并吸引中小企业落户。例如休斯敦就有意培育第三产业,其结果是该产业的劳动就业比例上升,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 50% 以上;

六、美化环境。由于行业特点,资源城市往往污染严重;

七、为工人提供转型所需的技能培训、鼓励工人创业;

八、偏重于实体经济,兼顾虚拟经济。因为过多虚拟经济易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则转型更加无望;等。

故而,“三危现象”正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当下,我国的资源城市当赶紧秉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空怀心态,及早多管齐下行动起来。

## 企业“升级版”要摒弃“粗暴管理”

赵建 国企高管

把“粗暴”等同于“魄力”是对工程企业管理根深蒂固的误解。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固执地认为善于“耍粗暴”的领导善于驾驭大局、熟略运筹帷幄。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现象在建筑行业极为常见。

在建筑企业,一些拥有高学历、有学识的企业管理者,一旦走上了主管的岗位,却很快变成了骄横跋扈、粗暴不断的“凶神恶煞”。而这种“蜕变”其实源自一种简单、普遍的判断:他们认为下属员工和劳务队都有欺软怕硬的心理,如果“太好说话”就会被视为软弱,“狠一点”才有威慑力。

这种理由乍听似有道理,然而却经不起推敲。把管理等同于“威慑”,把威信视为“听话”,而忽视制度体系的构建、人格魅力的培养、管理艺术的创新,只能使企业管理处于一种低层次、难以持续的状

态。而粗暴无礼、轻视员工努力、孤立“异己”的行为只能戕害企业的活力,也是建筑行业一些企业管理粗放、创效低下的主要原因。

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擅长“粗暴管理”的人进入企业高层,极容易让人们把他们的成功与其粗暴的行事风格联系起来,从而被更多的人模仿。

马克吐温曾经过:“远离那些贬损你的人,真正伟大的人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变得伟大。”

粗暴管理对员工自信的摧毁、人格尊严的侵犯,这种粗暴模式对个体的持续伤害、贬损和恐吓,最终将侵害员工心理和健康人际关系的构建,而由此编织的恶劣工作关系导致的情绪压抑,将毫无疑问的反射回工作环境中。

有调查显示:有 76% 的员工会因为粗暴对待而不能专心工作,创造力被明显压制;有 20% 的人会因为被粗暴对待而辞去工作;有 10% 的人会有意地以各种方式进

行报复。

建筑企业的“粗暴管理”实际上是粗放管理的“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实证明:企业执行力的不足,根源上是企业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企业主管管理素质的低下,而和“骂不骂娘”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前,企业要打打造管理“升级版”,其实就是要以最简朴的方式抵达科学状态,体现在对战略的准确把握、机制的完善构建、员工的和谐共存、效能的全面释放。管理领域的研究结果证明:“表扬与激励”比粗鲁指使他人收获更多,而“鼓动”人们参与决策比对他人为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更具激励性。

管理大师杜拉克曾告诫企业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管理者的失败。实际上,管理者的权威来自他能否激发员工的创造活力,而打造让员工自尊自信、积极参与的环境,必将会产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

## “副厅”辞职从商的个体理性和有限价值

朱四倍 教师

9月9日,记者从广州南沙区有关部门证实,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已辞职。目前,已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据悉,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记者尝试联系孙雷,但他未就辞职下海一事作出回应。((《南方都市报》9月10日))

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从商,不仅舆论关注度颇高,而且加上“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的信息,足以表明,社会还没有达到那种冷静和理性对待官员从商的地步,还在用异样和反常的目光审视之,简单地,并没有把这种官员辞职从商现象当成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

在一定意义上,结合我国官本位的社会风气,异样打量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从商,或有正常之处,但这也恰恰证明了这种行为的冲击力,一是对官本位观念的冲击,二是对公众观念的冲击,三是则表明即便是社会已经经历了几拨官员“下海潮”,但不仅未能建立政府系统和市场之间

的正常流动机制,更没有建立起对官员辞职从商的约束和疏导机制。这恐怕是“副厅”辞职从商引起关注的最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有离职率,“副厅”辞职从商能否常见化呢?“副厅”辞职从商,是社会进步和观念解放的结果,但就个体来说,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不好多说,但这或是一种理性,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反映。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家和官僚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其目标既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机构效率,而是个人利益,如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位。一些政府官员在经济人思维主导下,在自我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开始寻求别的利益的满足,如辞职从商。本则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广东省启功公推比选省外经贸厅厅长的工作。经过考核比拼,6名副厅级官员进入面试环节,其中就包括孙雷。那么,是不是无法更进一步升迁或者升迁无望而导致了辞职从商呢?

“副厅”辞职从商引起的舆论涟漪再次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土壤。应引起重视的是,“副厅”辞职从商并非仅仅与官员个体有关,而是牵涉到了诸多方面,除了其可能存在的进步意义

外,官员辞职是政府机关的人才流失。尽管任何个体从商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都应得到提倡和鼓励,但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长期从政形成的人际关系网,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可以为企业谋得难以想象的巨大利益,很容易给腐败留下空隙。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公务员辞职从商的规范体制,一无约束,二无疏导,几乎处于空白地带。这在相当程度上给辞职从商官员利用自身剩余的政治资源乃至成为官商两道通吃的“红顶商人”和利用权力余威调用公权为经商提供便利,提供了条件。

有学者认为官员弃政从商“是正常的人才流动现象”,称这在台湾、美国等地非常常见。但在国外常见的现象,在我国就不一定正常,更不能忽视了国外常见的前提条件——既无官本位的风气,又有特殊的限制条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那么容易辞职从商的。

“副厅”辞职从商或是个体理性,也仅仅具有有限价值——观念解放和冲击官本位的有限度,但从根本上说,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该靠什么样的机制让官员辞职从商和企业人才从政一样常见起来?既然企业有离职率,政府部门难道不可以吗?关键在于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

贾志勇 公务员

9月10日,Wealth-X与瑞银联合发布《2013 世界超级财富报告》称,受经济下滑、信贷紧缩及政府反腐败的影响,中国超高净值人数减少了 570 人。同时,很多中国的富裕人士将资产转移到了香港。该报告称“中国是亚洲经济增长的最大拖累”。除中国外,亚洲的超高净值人群增长了 6.9%,总财富上升了 8.7%。(9月11日财新网)

如果 Wealth-X 与瑞银联合发布的有关信息可信,笔者只感到高兴。起码,一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应该是平稳的,可持续的,有潜力有后劲的。如果源于经济下滑的影响,是全世界都面对的发展困境,那么中国也概莫能外。而信贷紧缩,一定是中国基于经济发展现实的必要举措。这也不容置辩。至于政府反腐败的影响,笔者想这最值得探究了。

向来有人对“腐败拉动经济”给予“谬赞”,信口雌黄地认为没有腐败,没有公款违规消费,就没有相关行业的兴旺和就业人员的安置,完全忽略了腐败拉动的经济,其实是一个无法回馈社会的“无底洞”,会让社会财富遭遇“百慕大”。这样的

经济发展状况,是“向死”的,而决不是“朝阳”的;是榨汁机式的,而决不是滚雪球式的。久而久之,会让经济丧失发展基础,激起社会阶层的思想对立和情感割裂,让国家和社会分崩离析。

这个意义上说,反腐影响经济,让经济发展步伐放缓,应该是好事。起码,这样可以挤出经济发展中的水分,使得相关经济数据不再是虚高的,一切都最大限度地回归真实和理性。比如目前的高档酒市场萎缩、月饼市场惨淡,都显现出一种消费步入常态化、平民化的征兆。这既有利于市场整合,更有利于项目定位,尤其会对社会投资产生积极的矫正、带动和引领,有效促进经济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实现市场公平、竞争公平、收入公平。

至于一些富裕人士的资产转移现象,更应该辩证看待。这一要拷问他们的经营是否依法依规,二要反思我们的经济环境是否科学规范、成熟完善、公道正义。尤其,投资者或经营者与经济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二者良性互动,才能使中国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才能让大多数人受益,才能让超高净值人数激增。

## 戏·画·闲·言·出境游：人格国格与出格

吴之如·文并画

《武汉晚报》报道,在法国当导游的全先生谈到文明旅游时说,他曾经带的来自沿海的一个选择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卢森堡线路的旅游团,团友以私营业主居多。沿途所到之处,有些团友一定要找赌场和娱乐场所,令他尴尬不已。旅程最后一天到机场时,因为很多物品与法国法律规定不符,不能退税,这些游客暴怒,当场撕碎退税单,还对着女性退税官员一阵辱骂。女退税官立即拨打电话报警,幸亏被小全制止,否则,这些游客就要被警察带走了。

全先生说的情况,或许有过出境游经历的同胞都不会觉得陌生。

笔者今年夏天第一次飞出国境,同家人随旅游团赴俄罗斯,就曾遇到类似的情景。团里有几位来自经济最发达城市的衣冠楚楚的男士,豪情满怀,“自信”过人,也许是财大气粗的缘故,总是透出趾高气扬的派头。每到用餐之时,他们那一桌必加菜斟酒,端杯畅饮,喧哗的调门之高,令四座皆惊。好在几乎每一顿都被安排在中国人开的饭馆里填肚,客人一般也都来自中国,因而并未惹出麻烦。

但是在莫斯科参观有世界四大博物馆之誉的一处沙皇宫殿时,那几名“成功



人格国格与出格,文明愚昧难融合;但愿同胞勿忘记:言行未可违公德。

世界很大,其实也很小。你是否知道,自己在公共场合的举止投足,都会被摄入公众眼帘,出格之举,往往自损人格,有时甚至会涉及国格?